

浮生烟梦录

再 华

2005年12月

浮生烟梦录

再·华

——

2005年12月

回忆与怀念

这是一个八十八岁老人回顾他一生经历的一份不完整的纪录。

他出生较早。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四个历史时期。他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到处流浪。后来他参加了革命，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他走过了祖国的许多河山，艰苦奋斗，历尽沧桑，终于熬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苦尽甘来，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而且潇洒地活到了今天。他的一生，如烟似梦，却又历历在目，难以忘记。

幸福的生活是美好的。而那苦难岁月的往事，更是终生难忘。因此他的回忆着重记述了他的前半生和逆境中的种种痛苦。他记述这些，只是为了怀念那些关心、教育、帮助过他的前辈以及很多真诚、善良、热情的朋友们；为了想留下一点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痕迹。

再 华

2005年12月1日

目 录

母亲的爱	1
另一位母亲的爱	6
母亲的相片	11
忆秦州	14
芦洲小学	17
挣扎在仇池古郡	23
姚家坪	27
千里迢迢回老家	33
北京晓市一家人	41
东北军中的二等兵	44
杨村镇里杜大哥	49
第一次看电影	54
走进天津市的富贵人家	56
在平津流浪	60
初进工厂做学徒	68
在上海，难忘的“八一三”	73
危难中的两位朋友	80
初到香港	85
带伞的人	93
歌乐山上访徐迟	97

难忘的“新华”岁月	101
一曲难忘	107
青春结伴到申江	112
重返香岛的收获	124
五星红旗飘扬在九龙天空	135
挂上了牛鬼蛇神的大木牌	141
揪“叛徒”	149
残破日记中的片段“文革”历史	156
在黄陂“五七”干校	164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76
流落人间度余年	183
家住佛山有“远亲”	191
天海楼轶事	198
踏遍青山人未老	204
人生不见如参商	210
哭为群、徐歌	216
来自第二故乡的亲人	223
孩子们的苦难历程	228
万里寻亲去西方	235
多伦多的天伦之乐	241
生命的奇迹	246

母 亲 的 爱

人们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母亲的爱。这话我却体会不深。

我小时候被寄养在四川成都的舅祖母家，不知有母。舅祖父是位唱灯影戏的艺人，住在成都盐道街。这条街当时有许多以抬轿为生的穷苦人。舅祖母是个肥肥胖胖的中年妇人，待我很好。我天天跟着她转来转去。

有一天，舅祖母带我去一条街，走进一家鸦片烟馆，那里有好多间屋子，每一个房间都有几张床，横七竖八地躺着吸大烟的男男女女。舅祖母走到一张床前，一个年轻的女人爬了起来，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和舅祖母说了几句话，我们便离开了。舅祖母对我说：“这是你的妈妈”，我才似懂非懂地知道“妈妈”这两个字的意义。

我五岁时，父亲来信接我们去甘肃省。于是，母亲来到舅祖父家，带我去照相。然后和一大批妇女乘轿子离开成都，经川北地区去甘肃天水。后来才知道，这些妇女都是驻防水水的军官的家眷。

当时，我刚被一条野狗咬伤了右小腿，人们以为是

疯狗咬的，给我配了很多药丸吃。母亲在轿子里抱着我，逢山过水便叫我的小名“么儿”。我便应一声。据说这是“招魂”，怕我的灵魂丢失在路上。

到了天水，母亲成了官太太，穿上绸缎的衣服，天天和一些官太太来往应酬。家里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妈子，由她天天陪伴着我。母亲是个鸦片烟鬼，她和父亲是一对奇怪的结合，父亲是河北人，自幼参加一种佛教组织“在理会”，这组织提倡不吸烟，不饮酒，因此父亲烟酒不沾，他却能容忍母亲吸大烟，而且一大碗一大碗地供给她大烟土。因此，母亲的烟瘾愈来愈大，天天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她很少关心我。六岁时，我进了私塾读书，母亲做了一根戒尺，上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逃学重打二十”。我才知道母亲会写字。虽然有这戒尺，却从未打过我。

渐渐的，母亲病了，她面容焦黄，骨瘦如柴，却仍然烟瘾很大，每天由一个老妈子替她烧烟。人们说她得的是“细症”，我也不知道是什病症。父亲天天叫卫兵去请全城最有名的中医来给她看病，吃了不知多少中草药也不见效。

这一年的端午节，上午，母亲病得很重，处于半昏迷状态。父亲和他的卫兵老胡，忙着给她换上新衣。这时候，母亲用她那微弱的声音不停地叫着我的小名“么

儿”。父亲叫我答应，我站在一旁漫应着，渐渐地，她叫“么儿”的声音弱得听不到了，父亲和老胡把她抬到客厅的一张门板上，我坐在她身旁边，望着她双目紧闭的面庞，以为她在睡眠，不知死是怎么回事，直到后来人们把她抬进棺材，我才明白妈妈没有了，不禁大哭起来。

于是，家里来了很多人，帮忙料理丧事。我穿上了白布做的孝服，新买来的丫头桂花也穿上孝服，她只有十三岁，不懂事，把同院一些妇女送给她的当地端午节流行的香荷包挂在孝衣上，五颜六色的一大串，也无人责怪她。

母亲的棺材被暂厝在城北弥陀寺，这是一座小庙。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请人把母亲的棺材用白布裹住，用黑漆油了七八遍。这时我九岁了，开始明白母亲死了，永远不会回来。家里有一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和丫头桂花与我相依为命，他们说我是个“没娘娃”，都很关心我。父亲忙于工作，整日不在家。这时我才不断地思念母亲，客厅里供桌上供着母亲的灵位，是一个木牌，上书“高门何氏宜人之位。”我才知道她姓何。我天天给她烧香望着灵位出神。

后来继母进门了。她也是鸦片烟鬼，娇滴滴的，一双改组派的小脚，天天躺在床上吸烟，对我不但冷漠，而且虐待我，我的布鞋经常是烂得没有后跟，她也不管。

这对我才真正体会到“没娘娃”的滋味了。更加思念母亲，想起母亲临终时不断地唤我的小名“么儿”时的情景，才知道母亲最关心的还是我。母亲有位十分要好的同乡赵大婶很关心我，常带我去她家吃饭，给我讲母亲的生平，才知母亲是成都市的一个城市贫民女子，因为贫穷，才嫁给了当军官的父亲。我常常是在赵大婶面前，流着眼泪吞下她做的可口的饭菜。

这时，市面上流行一种劝善书，上面有一个故事，叙述一家人有五个孩子，都叫“元”，他们的母亲死了，继母虐待他们，五个“元”常常去母亲坟前哭诉，这故事便叫做“五元哭坟”。对照五元，想起自己，不禁自悲自叹，也十分同情五元的遭遇。

十二岁时，我长大了，可以独自去弥陀寺给母亲烧香了，我便常常一个人带着香烛等物去给母亲上坟，跪在母亲的坟前，呜呜咽咽，流泪不止。而今，离开埋葬母亲的地方已经六十多年了。她的坟也早已被人平掉，修成公路，坟墓无影无踪了。能够思念和看到的，是母亲和我在成都照的一张相片，她城市贫民打扮，穿一身很旧的短衣服，慈祥地怀里抱着我。

我的母亲只活了三十三岁，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生前她对我并不很关心，但她临终前不断叫唤“么儿”的声音，使我知道这是她对我的无限深情，是母亲临死时对儿子十分怜惜，而又无可奈何的表现，使我终生难忘。

母亲的娘家有什么人，我一概不知。我只记得在成都市那一对抚养我的舅祖父、舅祖母老人，他们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但他们那慈祥的面容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

另一位母亲的爱

我除了生身的母亲，还有一位母亲，她是父亲的原配妻子。是一位慈祥、善良、一生都在华北农村过着穷苦日子的妇女。

我十四岁时，父亲死了，继母想改嫁，不管我的饮食，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根据父亲生前的教导，知道老家还有这位母亲，便写一信给他，告诉她父亲之死，自己困在甘肃。

信去不足一月，这位母亲突然汇来银元七十元，并回一信叫我回家。于是我跟随一位回旅商人辗转到了北京。再去信给这位母亲，请她来接我。

不久，这位母亲到了北京，一见面，她大约有四十余岁，却满头银发，牙齿掉得只剩下两颗。她穿着一身黑棉衣，一双小脚。说着一口家乡土语。

这就是将与我相依为命的另一位母亲。告别带我到北京的商人，母子二人连夜乘火车回老家。在靠近山东德州的桑园车站下车，雇了一辆大车回家。一路上，母亲详细地向我了解父亲的死因以及我读书的情况。并告诉我她有一个女儿和她一起生活。

我的这个老家，是河北大平原，一望无际，没有山，没有河，冬天树枝光秃秃的，北风吹来，沙尘滚滚，景色单调，显得很凄凉。

一进村，母亲叫我下车，以便应付村人的招呼。一

到家门口，姐姐迎了出来，许多邻居亲友闻讯而来，坐满一室。谈起父亲的死，母亲姐姐都哭了。谈到我，大家又眉开眼笑的说不停。许多年长的老人都向我夸赞母亲，说她心地善良，生活艰难，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这位母亲把我当作命根子，我是这个家庭能够延续香火的后代。这位母亲最怕这个家成了“绝户”，有了我做她的儿子，她高兴异常，对我关怀备至，她怕我生活不习惯，吃不得苦，每天都要去买一些白面做的馒头给我吃，她母女二人却吃玉米做的饼子，喝玉米熬的粘粥。直到我慢慢地能够吃粗粮为止。

回家后，我才逐渐了解到父亲与这位母亲分别已二十年之久。年轻时，父亲便外出当兵，抛下年轻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远走他乡。从此，母亲便靠十多亩土地独自生活，像一个寡妇那样带着女儿相依为命。守着那十多亩地，一年到头，从播到收获，样样都得求人，甚至每天吃用的水，也得请人从村外的井里挑回家。不但生活十分困难，还被父亲的弟弟一家人歧视，受尽他们的凌欺。

家里院子很大，却只有三间土屋和一间牛屋。院子里有几棵枣树。养着一条老黄牛和一条断了腰的狗。家中也没有什么陈设，只有两个木柜，一个方桌，一个炕桌和几条板凳。生活的确十分艰难。

这位母亲渴望我能成为一个庄稼汉，跟她种地，侍候她养老。于是我逐渐学会了挑水、喂牛、推磨碾玉米。冬天背着粪框到村前村后去拾粪，春天草刚发芽，便去野外挖草，用来喂牛。五月麦子黄了，去拔麦子。这里不像南方人用镰刀割麦，而是用手把麦子拔出来。一个人一天要拔一亩多麦子，拔得我满手是血泡，腰酸背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到了此时，我才觉得生活太苦了，我不能成为庄稼汉，我也不想做庄稼汉。我怀念在西北小城市的生活，我渴望外出去闯世界。

正是麦收季节，村里忽然回来一位现役军官，他在东北军中当武术教官，是本村本族的长辈，我要叫他“爷爷”，此人气宇轩昂，能说会道。每天晚上都在村里的小茶馆里高谈阔论，引来一大批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这时，我和母亲说明，想同这位军官外出去当兵，惹得母亲大哭一场，坚决不同意。事情闹得被这位军官知道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世，反而通情达理地劝我母亲，说这孩子很聪明，外出当兵，将来弄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总比在家里务农强。母亲是很尊重这位军官的，不得已同意放我跟他走。临别时，母亲哭着对我说：“小秃（这是家乡长辈对子女的昵称）啊，水流千遭归大海，你可不能像你爹那样，一去不回来。”众亲戚邻居也劝我，你娘这一生过的是穷日子，把你从甘肃接回来，多么不易，你千万不要忘记了她的恩情。

于是，我向母亲叩头，告别姐姐和亲戚，跟随这位军官，到了北平西苑，在东北军中当了一名二等兵文牒。

后来，我离开军队，进入天津，在一个富商家中当了一名小职员。母亲来信盼我回家，我也渴望回去探望她老人家。便回去了，母亲见到我大喜，说已为我相好一位姑娘，逼我立即结婚，我不同意，禁不住母亲的苦劝和本村老一辈人的劝告，说你娘这么大年纪了，孤苦零丁地一人生活，太艰难了。家里有个媳妇，既可照顾她的生活，也可安慰老人，还可生儿育女，三全其美。要我仔细思量。我不得已便和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子结了婚，婚后三天，便回天津。

想不到，回到天津。我被商人解雇，失业数月，做

了报馆的排字工人。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我从北到南，辗转十数载。直至解放初期，我在广州工作，回乡探望母亲，才知妻子已病故十多年。

我对不起母亲，更对不起这位可怜的妻子。他与我只共同生活了不足一个月。

母亲仍然一人生活，多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她是姐姐的养女，陪伴她过日子。

我回广州后，只能按月给母亲寄点钱，却没有接她来广州一同生活。

“文革”开始后，有两件事使我怀念母亲。一是女儿忽然想回老家去看看，她带着一个弟弟去了，写信回来，并寄来一张与祖母、姑妈等一大群父老乡亲的合影，可以看见母亲见到两个孙儿的高兴神情。她盼望高家能有后代的心愿终于成为事实，她笑得合不拢嘴。

另一件事是我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写信告诉母亲，说粤北气候很冷。不久，她即寄来一个大包裹，里面是新做的男女棉衣棉裤各一套。啊，这是母亲对我们的关怀，她大概是请人为我们做了这两套新衣。我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说不尽对母亲的感念。

“文革”还未结束，母亲忽然去世，终年 90 岁。姐姐打来电报，要我回去料理丧事。遗憾的是，我那里还在受审查，处境十分困难，无法回去奔丧。

1983 年，我终于回到老家探望姐姐。姐夫已去世，姐姐也是孤苦零丁地一人生活，每天由她的养女派女儿来照她，姐姐见到我，只有呜咽，没有眼泪。姐弟两人只能对泣而已。

有一天，姐姐养女的丈夫陪我去拜祭母亲。母亲的坟在村南的一片小树林内。这地方靠近一条大沙河，沙河的沙已侵入树林，只见林内到处都是流沙，在一片流

沙中有两个小石堆。养女的女婿说，这就是你母亲和你老婆的坟墓。我惊讶地望着这两个小石堆，不能相信这就是母亲的坟墓，它比南方一些农村的坟墓相差太远了。只要流沙再多一些，它就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想不到我这位穷苦一生的母亲，和她的儿媳竟如此凄凉地埋在这里，今后也很少有人来拜祭她们了。

想到此，我热泪盈眶地跪在母亲坟前，久久不能站立起来，想起母亲曾对我说过：“小秃呀，水流千遭归大海，你可要回来。”而我却违背了她的期望，永久地飘流在异乡。

我无法报答这位母亲对我的伟大的爱，我永远感到我对不起这位母亲，也对不起我的妻子，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大憾事！

母亲的相片

我有一张极为珍贵的相片，母亲的相片。

这是一张八寸大的相片。母亲慈祥、端庄地坐在一张摆着一盆水仙花的桌旁，怀里搂着我。我那时才五岁。是在四川成都拍的。

这件相片已发黄，有些模糊不清了。算一算，这张相片距今已七十五年。这是一个奇迹，没有想到我能把它保存到今天。

1932年秋天，我在天水告别继母回河北老家。只带着一个小包袱，里面包着一件黑棉袄，一条夹裤和一个小布包，布包里便是父母的三张相片的底片。它是三块四寸大的玻璃片，一张是父亲的半身相，一张是母亲和她的女友拍的，我站在中间，一张便是保存至今的这张相片的底片。

这三张玻璃底片跟随我十多年，走了许多地方，在我最危险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扔掉。1932年秋回到河北老家时，我保存着它；35年在平津失业流浪时，我带着它；36年去上海工作时，我仍然带着它；37年上海沦陷，我又失业，重返河北老家，我还是带着它；38年春天从天津去香港，我把它带到香港。奇怪的是，我生活坎坷，走了许多地方，竟然没有失手把它打碎。

38年三月，来到香港。我工作的单位是“大公报”，它的馆址在皇后大道33号，座落在皇后戏院旁边，是一

座六七层高的大楼。这里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这座大楼门口是一间卖古玩的旅游商店，二楼有一间照相馆和两间导游社，里面的导游女大部分是来自上海的姑娘。当时的所谓向导社，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妓院。据说这座大楼是国民党的外交官罗文干的产业，我们也常常看到罗文干的家属（两位小姐）在此出入。

香港人爱好摄影，照相馆林立。这座大楼的那间照相馆，设备豪华，顾客大多是洋人和一些阔太太、小姐。我每次走过它的门口，只能看看门前悬挂着的彩色照片，琳琅满目，多彩多姿。从来没有想到会到那里去照相或者冲晒照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这家照相馆的一位青年学徒。他很热情，我便向他请教，古老的玻璃片的底片还能冲晒吗？他要我拿给他看看。不久，他便给我冲晒出来。我终于看到了父母的容貌，高兴得流下泪来，一再向他道谢。并问他能否把它放大，他说可以。我便把母亲搂着我的这张请他放成八寸大。也就是一直保存到今天的这一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人被抄了家。我把自己多年写的日记、朋友来信都烧了。1949 年在香港与妻子结婚时拍摄并放大的彩色照片，因为是我穿西服、她披着婚纱拍的，也烧掉了。后来翻到父母的照片，我有些踌躇，父亲的半身相片，身穿马褂，头戴皮帽，一看就知是个士绅之类的人物。他生前曾在北洋军阀的军队当过官。为了避免麻烦，我只好把它撕了。

剩下母亲的两张相片，一张是她和女友拍的。这时母亲正在做官太太，绸衣长裙，面容丰满，人们看得出这是一位“太太”。我也只好忍痛把她撕了。只有这张在成都拍的，母亲穿一套朴素的短衣裤，白袜布鞋，像个